

■ 大家印象

徐森玉先生与上海博物馆的古籍事业

柳向春

徐森玉(1881—1971)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文物鉴定家,可惜的是,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是为了国家的古籍、文物事业,仆仆道路,席不暇暖,直至年过八旬,才在年轻同志的帮助下,写了几篇论文,而其一生所学,大皆并无传承,甚为可惜。其外孙女王圣思教授曾言:“外公一生大半是以实地考察古迹、当场鉴定版本目録金石碑帖书画为主,与人则以即兴交谈、书信往来为多。”可谓实录。因此之故,徐先生对于古籍、文物方面的研究心得,竟险成广陵散,实在令人感喟不已。幸而在其晚年,曾得英才弟子而教育之,才使其满腹经纶略得流传,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徐森老之接触古籍、文物,应是始于青年时期就读于山西大学堂之时。崭露头角的森玉先生,受到前辈如山西学政宝熙的赏识,得以与其论学古今,并纵览其所藏,奠定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后来又得以进入学部,正式参与相关文化事业,先后任职京师图书馆及后来的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上海文管会、上海博物馆等处,对相关文物、古籍事业都尽心尽力,也因而奠定了他在文博、图书馆界的崇高地位。徐森老自而立之年开始投身文化事业,奋力于此间达一甲子之久。如今两岸之文物、古籍布局,多与森老当年举措相关,其一身所系可谓重矣。森老晚年先后主持上海文管会、上海博物馆,筚路蓝缕,最终奠定上海博物馆作为世界知名博物馆之基础,使得上海博物馆享其余年荫至今,着实令人感佩。

70年前,在当时的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先生的主持下,上海博物馆正式成立。至1953年7月10日,文管会召集委员会议,讨论图书、博物馆办公与文管会分家事宜。初议以上海文管会迁回天平路办公,主任委员拟郭子华(山东省府主席),先生副之。图书、博物二馆独立,图书馆长车载,副馆长李芳馥;博物馆长拟曾昭燏,副馆长杨宽。于7月24日,上海图书馆脱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改隶上海市文化局。8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更名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会址迁至天平路四十号。但在二馆独立之际,文管会实际上曾有将数年搜罗、征集、捐赠之文物、图书分家之举,大概而言,除与古代艺术密切相关的文献之外,其他古籍、碑帖均划归图书馆所有。虽然当年上博所得之古籍、碑帖相对而言数量甚少,但现今上海博物馆的古籍、碑帖收藏,就是以此为基础之一发展起来的。

1960年11月,徐森玉先生以上海市文管会主任兼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副之。自此而后,森老便于上海博物馆各项事业的发展,更加负有直接责任。而其对上海博物馆古籍事业的贡献,应该来说除了本身作为领导所需要承担的本职工作而外,还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对古籍人才的培养,再就是对相关门类古籍文献的搜集和文献体系的建设。而这两点,显然是徐森老从事文博图书馆事业数十年来一直念兹在兹,并着意留心培养和建设的,充分展示出他宏观的视野和开放的格局。

人才培养

上海博物馆已故副馆长,著名的陶瓷、钱币、碑帖文献研究专家汪庆正先生,在大学毕业后进上海文管会不久,就成了徐森老的学术助手。我们现在所能看到森老六篇仅见的学术论文,都是与文献相关,基本都是在汪先生的配合下完成的,如《宝晋斋帖考》《兰亭续帖》两文,就明确说明是请“青年同志”帮忙的,而这个“青年同志”,主要指的就是汪先生。汪庆正在《隋龙藏寺碑》一文中曾经说:“我在徐森玉师的指导下,将这个本子(上海图书馆《龙藏寺碑》)作了一次校勘。”汪氏又有《东汉石刻文字综述(上)》《南朝石刻文字概述》两文,显然是在徐森老《西汉石刻文字初探》一文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可以直接反映森老对于汪先生学术方面的影响。汪先生曾直接说:“我在50年代中期,曾追随森老学习碑帖……”又说:“1961年陈叔通先生携宰平先生的《帖考》手稿来沪,希望在沪出版,先师徐森玉先生命我以他的名义多方奔走,由于当时的环境,未能如愿,《帖考》手稿置我案头半年以上……1962年,徐森老作一短序后,连同原稿退还北京……”还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徐森玉师的主持下,命我联系原北京庆云堂的张彦生先生以3000元的巨款征集到未刻宋拓的《宝晋斋法帖》一套(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传世其他《宝晋斋法帖》是翻本,内容全异。”又说:“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师从徐森玉先生学习碑帖以来,陆续看到了很多流散到日本的中国古代书迹的珂罗版印本……”都可反映出数十年之后,汪先生于老师教诲之念念不忘。不仅如此,汪先生在传道授业之时,也常常会想起老师之栽培之功,如2022年1月28日,汪氏弟子复旦大学刘朝晖教授曾见告:“汪先生当年的和我说起,陈(梦家)先生是他大师兄。学术他有不懂的,徐森老叫他先去请教陈先生。”都能看出徐汪二人之师生情谊。在他的传授、教学的过程中,也会学习他的老师徐森老当年的方法,来着意培养年轻人的某些方面的技能,如2022年12月1日,其弟子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现世茂文化公司总裁、福建省世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李仲谋先生见告:“(汪)先生经常有意把一些文物爱好者或收藏者给他的来信交给我们先一些年轻人代他回复。记得有一次他把信交给我的时候,说:‘我以前做徐森老的秘书时,他就常常把各种各样的信让我回复。那时各个领域乱七八糟的都有,很多根本都不懂。你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做,回去赶紧查数据想办法写好回信。还不能马马虎虎,徐森老要在最后再看一遍。但这样非常锻炼人,对扩大知识面和深入研究帮助很大。’就这样,几年来我代先生回了不少信,每次写好后,都拿去给先生过目,先生很认真地看,提出他的修改意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汪先生晚年尽心竭力所购之安思远旧藏《淳化阁帖》,经汪先生考证,为存世“最善本”,而细绎其论证之最要之处,就是利用了拓本中所存《阁帖》刻工一事。众所周知,利用刻工来断定版本,正是古籍版本学之重要手段之一。此又可见汪先生生活学活用,善于将森老所授,扩展利用,横向比较,终究穷究其论点的高明与巧妙。作为业界标杆人物,汪先生后来虽然并不以古籍、碑帖方面的专长为人称道,但他显然是起步于此,并时时刻刻以当年森老所教诲的古籍、碑帖知识为出发点,经过自己多年不懈的努力,才最终成为文博界的一代传

奇。而古籍、碑帖事业,其实也是汪先生一直所留意和瞩目的,无论是上海图书馆的翁氏图书回购,还是上海博物馆的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钱镜堂旧藏明人尺牘、《淳化阁帖》最善本、甲戌本《石头记》,都是在汪先生的力推之下,才最终得以化私为公,成为国家所藏的。除此之外,汪先生对于上海博物馆的古籍、碑帖方面的藏书建设,也多有指导,一直用心用力。这些都可以看出徐森老对文献用心的态度在他身上产生的影响。

文献建设

上海博物馆古籍、碑帖收藏来源较为广泛,主要有四大类型,即从旧上海市立博物馆接收者,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者,各收藏家及其家属捐赠者,以及建馆以来陆续征集购买者。而此中又尤以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者为多。1949年8月,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元帅命组织上海市文管会,下设图书、古物二室及一征集组,聘柳诒征先生任图书组组长。此时征集、辨别、分类、著录图书之各项大概,皆可见于柳先生之《幼堂日记钞》及《检书小志》中。而当时征集之典籍,虽然大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建成后移交,但仍有一部分遗存,构成了现在上海博物馆所藏古籍之基础。除此之外,上海博物馆所藏古籍的另一主要来源就是诸位收藏家及其家属的捐赠,如现存古籍封底多有注一“荫”字者,就是著名收藏家李荫轩先生的旧藏。1979年随同李先生其他藏品,在当时的上海博物馆,而馆长徐森玉先生的旧藏,则在封底都注有“徐森玉”字样。

根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会史(初稿)》介绍,在1953年上半年将文管会文物图书分别划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之后,至1958年9月份止,又接管图书共达221455册之多。当然,这之中主要是普通图书为主,但也包括了不少的“善本和珍贵善本”;又有一些藏书家如金山高氏、金山姚氏、海宁朱氏、平湖金氏、吴江薛氏和刘晦之、柳亚子先生等等先后捐赠藏书于文管会。这些书中,不少都是罕见的抄本、刻本、校本和稿本,共计30批次、26342册;当时文管会收购的各类善本又有1311种6266册。所有这些珍贵的图书、拓本等,后来大都又拨交给了上海图书馆,但仍有一些留存于上海博物馆中,如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刻杭州雷峰塔出《陀罗尼经咒》、明清以来各家诗翰数千通等。当时又以上海文管会名义先后影印元郭界《客杭日记》、清初刻本《赵定宇书目》等,使得这些珍贵文献化身千百,不虞散佚。这些都反映出包括徐森老在内的文管会、博物馆领导对于文献的重视。

徐森老个人对于上博的文献建设方面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身体力行参与文献的征集,一是在其逝后其家属将其家中所藏文献全部捐赠于上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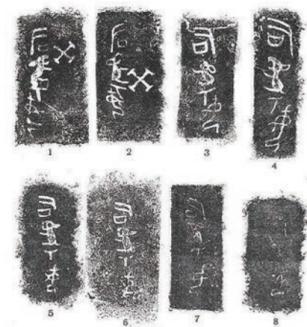
关于徐森老亲身参与文献征集一事,因资料缺失,现已难以一一重述,但关于他当年力主征集《萝轩变古笈谱》一事,据方行《文献选编二三事》一文中的记述,就很能代表森老对于文献之重视。方行在文中写道:“文革”前,浙江拿来一部书,请徐森玉鉴定。徐森玉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版本专家,老夫子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看到书竟跳了起来,叫道:此书居然还在人间!那书就是《萝轩变古笈谱》,是明朝天启年出版,这可是孤本了。书鉴定完,徐森玉不肯还了,要留在上海。人家是来鉴定的,不是来卖书的,但老头子无论如何不肯还。当时浙江宣传部的部长是上海调去的,我建议去找石西民,因为石西民原来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浙江的那个宣传部长先前是他的部下。徐森玉就说要去拜望石西民,我说他很忙啊,徐森玉说没关系,我六点钟到石西民家门口去等好了。后来石西民找到我,我说老方,那个老头子找我我要干嘛?我说我如何如何,石西民说,让他千万别来啊,他老夫子六点钟等在我们门口不象话啊。我就对石西民讲了书的事情,请他和浙江讲讲看,让浙江省委压下去。浙江省委和对方商量后说,实在不行就交换吧。开价大得很,要十六张明清书画,郑板桥是最起码的档次。我们‘上博’一口答应。这才换来了这本《萝轩变古笈谱》。”《萝轩》一书在1963年归上博所有之后,在次年的2月,文物出版社就来联络影印出版,并获得了徐森老的支持。到了6月,朵云轩又来联络,希望能够复制出版。但之后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化,这一想法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在方行主持下得以落实。

另据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陈燮君撰文云:“汪庆正先生曾动情地说:‘我的老师徐森玉说过,今后有几件东西一定要弄回来……《淳化阁帖》出去了,不知道在哪里,以后一定要弄回来。……这四卷《淳化阁帖》是中国帖学的祖宗,如果不买回来,那么中国帖学之祖就不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消失多年的《淳化阁帖》出现于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立刻引起国内文博界的极大关注。可惜当时由于国家百废待兴,没有余力收回这件国宝。后来几经辗转,这几卷《淳化阁帖》被美国的安思远在纽约市场上拍卖购得。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轰动一时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之后从美国传来消息:年事已高的安思远先生看到了展览报道,有意出让珍藏多年的《淳化阁帖》,希望在有生之年,让这件文物回到中国的怀抱。此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立刻意识到了机会的难得,数十年来,他从来不曾忘记徐森老的嘱托和牵挂,也一直密切关注着《淳化阁帖》的动向。”可见,此一最负盛名的《淳化阁帖》“最善本”的回购,其实也是一桩弟子使得老师多年夙愿得偿的佳话。又据郑重《王安石两种遗作的回归》一文中描述:“对于这段历史情节,作为徐森玉的秘书汪庆正,当时他和徐森玉、谢稚柳在一个办公室,他回忆:这两件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概是1962年左右,徐森老就曾想办法去弄回来,谢公(稚柳)也知道,就在办公室里不止一次谈过这件事情。正好那天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来上海,他就把我拉出办公室说:‘小汪,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情,听说你们在寻王安石手书经卷和《王文公文集》?’我说:‘是啊。’赵万里说:‘《王文公文集》这件东西,你无论如何跟徐森老说说,要拿到北京去,不能留在上海,这是全国最重要的东西。’我说:‘你太心急了。’赵万里就说:‘我请你吃饭。’其实这件东西是想通过徐森玉的儿子伯觉去寻找,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施。赵万里觉得指望我不行了,他就回到办公室亲自跟徐森玉讲,说:‘今天我请客。’徐森玉说:‘哪里去吃?’

(下转8版)

古代青铜器中的兔形器和纹饰

杨曙明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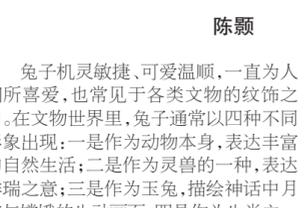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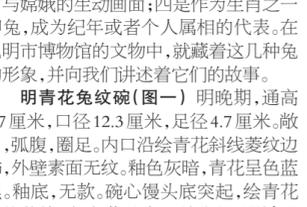
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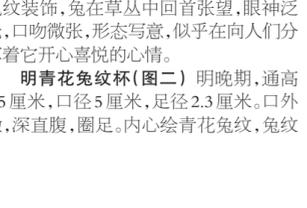
图九



图一〇



图一一



图一二



图一三

图一四

图一五

图一六

图一七

图一八

图一九

图二〇

图二一

图二二

图二三

图二四

图二五

图二六

图二七

图二八

图二九

图三〇

图三一

图三二

图三三

图三四

图三五

图三六

图三七

图三八

图三九

图四〇

图四一

图四二

图四三

图四四

图四五

图四六

图四七

图四八

图四九

图五〇

图五一

图五二

图五三

图五四

图五五

图五六

图五七

图五八

图五九

图六〇

图六一

图六二

图六三

图六四

图六五

图六六

图六七

图六八

图六九

图七〇

图七一

图七二

图七三

图七四

图七五

图七六

图七七

图七八

图七九

图八〇

图八一

图八二

图八三

图八四

图八五

图八六

图八七

图八八

图八九

图九〇

图九一

图九二

图九三

图九四

图九五